

新闻 研究 资料

● 回忆新华广播电台

温济泽

● 关于《中国报学史》

戈宝权等

● 难忘的新闻生活

王惠平

杨克现等

● 新华通讯社发展史略

刘云莱

● 抗战时期山西报刊简介

邵挺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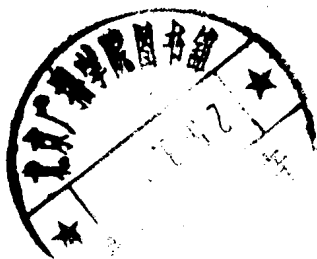


中国新闻出版社

新闻研究资料

第三十二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
《新闻研究资料》编辑部编辑



中国新闻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十月

封面设计: 陈长敏

责任编辑: 阎焕书

新闻研究资料

第三十二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

《新闻研究资料》编辑部编辑

•

中国新闻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景山学校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7印张 150,000字

1985年10月第一版 1985年10月第一次印刷

统一书号: 7363·044 定价: 0.80元

北京市期刊登记证第1400号

目 录

回 忆 录

- 回忆延安和陕北新华广播电台……………温济泽(1)
播音三十五年(二)……………葛 兰(25)
回忆《新民报》的机构设置……………钱辛波(31)
淮北黑板报忆旧……………戴 邦(36)
《午报》始末……………赵展鹏(42)

关于《中国报学史》

谈戈公振和他的《中国报学史》

- 写在《中国报学史》重印本的卷首……………戈宝权(46)
《中国报学史》史实订误
……………杨瑾琤 宁树藩 方汉奇 王凤超(57)

难忘的新闻生活

推翻“两个估计”的前前后后

- 记者三写材料，说明问题真相……………王惠平(91)
啊，冰山之父！
——回忆新中国早期登山系列报道……………杨克现(99)
和读者脉搏息息相通……………刘 军(116)

新闻事业史·史料

- 纪念郁达夫殉难四十周年……………(121)
- 致电英京新闻界……………郁达夫(122)
- 九一记者节……………郁达夫(123)
- 郁达夫与新华记者演剧筹赈大会……王慷鼎 姚梦桐(125)
- 新华通讯社发展史略(二)……………刘云莱(130)
- 抗日战争时期山西报刊简介
- ……………邵挺军 辑录(183)
- 记《先进报》……………蒋新生 鞠 盛(166)
- 长沙《实践晚报》……………湛 震(168)
- 昙花一现的《中国晚报》……………谢 琰 张炎君(178)

报海拾贝

- 马克思和《中华之友》报……………陈力丹(215)
- 孙中山先生对上海《中国晚报》记者的谈话……………(218)
- 应修人领导创办过报刊……………(220)

回忆延安和陕北新华广播电台

温济泽

1943年1月，在延安，我从中央研究院调到了解放日报社。这是我做新闻工作的开始。

解放日报社在延安有名的清凉山上。清凉山靠近延安城，在城的东北角，中间隔着延河，它就在延河之滨。在这座山头上还有新华社。我一到清凉山，就听说新华社每天除了发文字广播，还有口头广播，口头广播的电台叫做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延安台是在1940年底建成的。当时延安遭到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的严密封锁，物质条件极端困难。发射台的发射电力只有二百多瓦，发动机是用一个旧汽车头改装的，燃料是木炭，因此电压很不稳定，广播出去的声音忽高忽低，常常听不清楚。我到清凉山不久，就听说因为播出效果不好，一时又很难改进，加上发射机发生故障，只好停播了。

1945年8月14日，日本政府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胜利了。延安军民万众欢腾。这天晚上，我们正在紧张地工作，忽听得远处一片锣鼓和鞭炮声，从清凉山上向城南新市场一带眺望，高举火炬游行的人们，象是几条火龙在飞舞。听采访回来的同志说，有些人是把自己的破旧棉衣浸上

油当火把的，还有些商贩把零售的小食品分送给游行的人们。延安沉浸在胜利的欢乐之中。

新华社的同志把唯一的一台收音机安上广播喇叭，摆在窗台上。很多人都跑到窗前的山坡上听广播。这天晚上，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改变了日常的广播节目，反反复复地广播以蒋中正名义发表的所谓“命令”，“命令”解放区抗日军队“就地待命”，而叫伪军去受降并维持治安。抗战八年，蒋介石躲在峨嵋山上，现在要下山来抢夺人民的胜利果实了。大家听了非常气愤。

我跑去找博古同志。他当时是解放日报社社长，又是新华社社长。我到了他住的窑洞里，他正在给军委三局局长王诤同志打电话。等他放下话筒，我告诉他刚才听到的广播。他说，党中央已经料到会发生这种情况，正在准备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他又说，在这个时候，急需把我们自己的口头广播恢复起来。原来那部发生故障的发射机早已修好了，已经用于文字广播。王诤同志答应再作进一步的改装，很快就可以恢复口头广播。我听了很兴奋。

就在这天晚上，王诤同志召集三局的无线电技术人员开会，作了紧急动员，布置突击改装发射机的战斗任务。十几位同志连续奋战了几昼夜，终于胜利地完成任务。试播的那天晚上，我们又聚集在山坡上收听。虽然因为电波越距未能听到，但是从敌后各根据地和从重庆等地发来的电报，知道他们听到的声音是清楚的。

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在9月5日正式恢复广播。这一天，是延安军民举行庆祝抗战胜利大会的日子。广播报道了庆祝大会的消息，宣传了全国军民，特别是各抗日根据地军民艰

苦抗战八年所取得的伟大胜利，表达了延安及各根据地军民为保卫胜利果实和建立新中国而继续奋斗的坚定立场和坚强决心。我国人民广播史上的一场新的斗争就这样开始了。

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恢复广播的时候，我仍在解放日报社工作，主编副刊。我们非常重视延安台。《解放日报》及时报道了延安台恢复广播的消息，副刊连续发表了几篇介绍延安台的文章，还陆续选登过延安台播出的几十篇专稿。

二

1946年6月，延安解放日报社和新华社进行了大改组。这是当时革命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抗战期间，党中央直接掌握着两个新闻宣传工具，一个是延安《解放日报》，一个是新华社广播（包括文字广播和口头广播）。在长时间内，对这两个新闻宣传工具，是以《解放日报》为主，重要的消息、文告、社论和文章等，都是先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然后新华社选择和摘编报纸上的东西，进行广播。1946年6月，到了全面内战爆发的前夜。这种新的形势要求把重要的消息、文告、社论和文章等，及时地先由新华社播发，同时发给《解放日报》。因此，新华社的机构需要扩大，而解放日报社的机构可以相应缩小。当时，新华社成立了几个编辑部，其中之一就是语言广播部，我们习惯地叫它口头广播部，也就是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编辑部。新华社最早只有一个口头广播稿的编辑，以后逐渐增加到五个同志，成立了语言广播组，由杨述同志担任组长，编辑有张纪明、韦君宜、苗力沉、刘志云同志。改组以后，人员有了变动，杨述同志调任新华社秘书，张纪明同志调到新华社解放区部，另外又调来

刘衡和高虹同志。我调到语言广播部任主任，开始兼《解放日报》副刊部的工作，后来杨思仲（陈涌）同志接替了我在副刊部的职务，我才专门做口头广播工作。

延安《解放日报》编辑部原来占用在半山腰的两排十几孔石窑洞，改组后新华社几个编辑部也都搬到这里办公。由于窑洞比较少，语言广播部就副刊部挤在一个窑洞里。

随着新华社的改组，原来由军委三局管理的广播电台的发射台和播音室、机务人员和播音人员，也划归新华社统一管理。新华社成立了电务处，统一管理文字和口头广播的机务工作。因为播音室跟机房在一起，播音员都列入了电务处的编制，但业务上播音工作由编辑部领导。原来播音室在西北郊裴庄，发射台在阎店子，离清凉山有三十里左右，这时都搬到离清凉山不到五里路的文化沟，以后又搬到更近一些的北关。当时美军观察组住在北关，用电的条件比较好。

延安台在1940年到1943年播音期间，最早的播音员是姚雯同志，以后是徐瑞章同志，肖岩同志。1945年重新恢复广播的时候，开始是慕琳同志，以后调来了孟启予、于一同志。到1946年春天，又调来了钱家楣同志，机务组有毛动之（组长）、刘振中、刘致远、李志海、武荣华等同志，他们都是既负责文字发报，又负责口头广播的机务工作。

三

语言广播部成立的时候，草拟了一个暂行工作细则。细则规定语言广播部的任务是：“建设全国性的语言广播机关，宣传党的政策和主张，报道国内外时局的动向，有计划与有系统地宣扬我党我军与解放区的事业和功绩，揭发国民党的

腐败黑暗统治并宣传与鼓励其统治区广大人民的民主运动。”这里说的“建设全国性的语言广播机关”，就是说要办成面向全国的广播电台。它以全国人民为宣传对象，但重点是国民党统治区的听众。根据这个任务，细则对节目的组成、稿件的编写、工作的程序、人员的分工、业务的研究等等，都作了详细的规定，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开头，延安台每天播音两小时，分两次：一次在中午十一点半到十二点半，一次在下午六点到七点。节目有：新闻、通讯、评论、解放区介绍、解放区政策讲话、故事、记录新闻。在全面内战爆发后，每次播音增加了半小时的《对国民党军广播》节目。从1946年9月5日起，也就是从延安台恢复播音一周年的日子起，把下午播音时间又延长了半小时，增加了广播评论、演讲、人民呼声等节目。

新闻、通讯、评论节目的广播稿，都是根据新华社发的文字电讯稿，按照国民党统治区听众的需要进行选择，按照口头广播的特点和要求进行加工、改写而成的。广播评论、解放区介绍、解放区政策讲话这几个节目的广播稿，都是我们自己编写和组织的。广播评论主要是对国民党统治区发生的一些事件发表的评论，有些事件，新华社不发表评论，延安台有需要，我们就自己写。解放区介绍节目，系统地介绍了当时十九个解放区创建的历史和现状。解放区政策讲话节目，讲解了解放区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所实行的政策，有些是跟国民党统治区对比起来讲的。请知名人士演讲，当时没有录音设备，都是请到播音室里直接播讲。朱德、林伯渠、王震、廖承志等同志都播讲过。因为交通不便，请人播讲很不容易，所以讲演的次数不多。遇到特别事件，

有时候还办特别节目，例如，为了配合国统治区人民举行要求美军退出中国运动，延安台曾经举办连续十天的特别节目，请知名人士作广播讲话，揭露美帝国主义支持蒋介石独裁卖国的罪行，号召全国人民团结一致，把美军赶出中国。在人民呼声节目里播出的，都是从国民党统治区进步报刊上选的爱国民主人士和各阶层人民反对内战、要求民主的文章和公开信，仅1946年7、8两个月，就广播了三十四篇。针对国民党统治区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的现状，延安台除去报道了解放区物价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的新闻和通讯外，还办过《行情》节目，报道解放区一些新解放城市的物价，跟国民党统治区物价作对比。

对国民党军广播节目，曾经起过特殊作用。它的内容，除去向国民党军队宣传战争的形势，讲解我军的政策，给他们指明出路以外，大部分时间是播送起义和放下武器的国民党军军官名单，包括姓名、年龄、职别、籍贯、起义或放下武器的地点、家属通讯地址等。还报道他们到解放区以后的生活情况，广播他们写给家属、亲友或同事的书信。

延安台的广播曾经发生过很大的影响。我们曾经接到过从北平、南京、昆明、重庆等地突破重重封锁带到延安的信。听众在信里热情地告诉我们，他们怎样冒着生命危险，秘密地收听延安广播。有个学生说，他常常是关起宿舍的门，躲在被窝里收听。有一封信里说：“听到延安的声音，就象在茫茫的黑夜里见到了光明。”国民党军的军官也有很多人十分注意收听延安广播，许多起义和放下武器的军官都说过，他们是听了延安的广播，明白了内战的起因、形势和前途，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政策，才下决心走到人民方面来

的。1946年6月26日，原国民党空军上尉刘善本驾机起义，飞到延安。他告诉我们，他就是收听了几个月延安台的广播，看清了国家民族的前途，在6月17日又听了延安权威人士关于反对美国国务院提出军事援蒋法案的声明以后，下决心离开内战的漩涡，投奔延安的。我们请刘善本向国民党空军人员作了两次广播讲话，一次的题目是《赶快退出内战漩涡》，另一次题目是《谁是谁非——谁是燃起内战烽火的人？》。后来有二十几位国民党空军陆续起义，他们都说是听了刘善本的广播讲话，才下决心到解放区来的。国民党统治区的一些进步报纸，经常抄收延安台的记录新闻，改头换面地刊登在报纸上。海外侨胞办的《华侨导报》、《怡保日报》等，也经常抄收刊登延安台广播的消息。

当时延安台的发射电力比较小，但是由于有电力较强的张家口、邯郸和齐齐哈尔等地的新华广播电台转播，因此，延安台的声音传播得比较远，香港、南洋一带也都能收听到。

四

在延安，我们的生活是紧张的，艰苦的。

前面说过，有一个相当长的时间，编辑部离播音室有几十里路，为了赶上播音，每天必须在下午两点钟以前把稿子编好，通信员骑马送走，遇到急稿，我们往往顾不上吃饭，几个人同时编的编，抄的抄，才能不误发稿时间。有时候连这样做也来不及，只好用电话将稿子传给播音员，她们记录下来再广播。在延安，电话传的声音有时很微弱，打电话是很困难的。

送稿要过延河。遇到夏季山洪暴发，河水猛涨，通信员

就把稿子用油布包好，顶在头上，泗水过河。在洪水中游泳是很危险的。有一次，我走到延河边，刚要过河回清凉山，看到山洪奔腾而下，我想抢在浪头到来之前过河，不料走到河中间，浪头已冲到身边，冲得我直摇晃，幸亏有位老乡推着我才游上了岸。上岸后，我浑身都是泥浆，除了两个眼珠外，满头满脸都糊上了一层泥浆。回到清凉山，泥浆被太阳晒干了，我变成了一个泥人！

那时候，没有录音设备，播音员都是直播。在正常情况下，要让播音员有一段准备时间，如果稿子送迟了，播音员就没有多少时间准备，有时候，甚至根本来不及看一遍稿子，就该播音了。

组织文艺节目，更不容易。平常的文艺节目都是播放唱片。当时有二十多张唱片，其中多半是京剧，也有世界名曲，新歌曲的唱片很少，只有《渔光曲》等几张。因为唱片太少，只好反复使用。有时，播音员唱几支歌，说几段快板，也作为一次文艺节目。电台的工作人员中，有几位会拉会唱的，有时也组织一次文艺节目。有几次，我们还请军委总政文工团和鲁艺的同志到电台演播文艺节目。他们住地离电台远，我们都是向部队借用卡车接送。文工团的人比较多，窑洞里站不下，就站在窑洞前的山坡上演出，有时候山坡上的羊叫声，也会混着播出去了。

我们住的是窑洞，冬暖夏凉，还算舒适。吃的主食是小米，有时吃馒头或面条。菜一般是煮白菜、萝卜、南瓜等，有时还有点肉，都是用大木桶打到办公室门口，每人用瓦钵子分了吃。我们写稿用的纸是有光纸，写信多半是边区自己用马兰草造的纸，信封都是用旧报纸糊的，而且往往是正面

用一次，背面用一次，然后贴层白纸，再用一两次。

1945年，陕甘宁边区发生了旱灾。新华社和解放日报社开展了生产救灾运动。社里成立了救灾委员会，把全社人员，包括家属，除老弱病残和十五岁以下的儿童外，都组织起来，编成一支劳动大军。抽出二十五人组成一支突击队，到南劳山农场抢种五百亩秋田，定的任务是生产细粮五十石。其他人员利用附近荒山地，大量种小日月糜子、荞麦和南瓜、洋芋、萝卜等，再加上挖野菜等办法，每人要完成能折合一斗粮的任务。同时，厉行节约。为了节约粮食，每人每天定量为十四两（折合现在十两制为八两多），并且严格执行按人下米做饭，不够就用瓜菜代替。原来规定每两年发一套棉衣，每年发一套单衣，也停发了。过冬，大家就组织起来，集体互助，把旧棉衣拆洗缝补了再穿。没有换洗的衣服，就到山沟里的小河边，把衣服脱下来洗干净晾好，然后到河里洗个澡，等衣服干了再穿上。1946年第四季度，连日常经费和个人津贴也停发了。全社人员又组织起来，自己动手，发展生产，实现了缝补用布、添补棉花（添补旧棉衣、棉被用的棉花）、棉鞋、蔬菜、木炭、马草等完全自给，连一部分办公用品，也要用自己生产得来的钱买。过去还发灯捻，后来不发了，点完了就把棉被里的棉花扯一块搓成灯捻点灯。破得不能再穿的衣服，就撕成布条打草鞋。工作和生活条件这样艰苦，可是同志们为了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都以苦为乐，以艰苦奋斗为荣。

五

1946年6月底，全面内战爆发，蒋介石对解放区发动了

全面进攻。各解放区军民奋起自卫，仅仅四个月的时间，就粉碎了蒋介石的全面进攻计划，使其兵力遭到重大损失。此后，蒋介石不得不把全面进攻改变为向陕北、山东两个解放区的“重点进攻”。

为了对付和粉碎蒋介石对陕北的进攻，11月11日，党中央召开了中央机关和延安地区一千多人参加的保卫陕甘宁边区的动员大会，彭德怀副总司令、朱德总司令、刘少奇同志等先后在会上讲了话。彭德怀副总司令号召全体干部要准备过更艰苦、更紧张的战时生活，准备多少人住一间窑，准备拿大腿做办公桌，准备随时随地无条件地服从命令，全心全意去争取胜利。朱德总司令在讲话中号召边区三十万壮年男子和三十万壮年妇女，都紧急动员起来参加战争，人人学会最简单的埋地雷和投手榴弹两项战术，实现全民皆兵，来保卫边区。刘少奇同志在讲话中指出，必须按战争的需要，改变全党的组织方式和生活方式。11月12日，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又召开了边区一级干部的动员大会。这样，全延安和全边区党政军民立即进入了备战状态。12月，国民党军队进攻关中，延安和边区又从备战动员转入战斗动员。

在备战动员和战斗动员之后，新华社的大部分工作人员分批疏散到延安东北一百八十里的瓦窑堡，只留下少数人坚持工作。语言广播部留下来苗力沉、刘志云、杨兆麟和我，杨兆麟同志是从南京撤退到延安的，分配到语言广播部工作。播音员留下来钱家楣同志，她坚持到最后撤离延安。临时调来播音的有杨慧琳和吴作贤同志，但这两位同志播了没有多久也疏散了。

语言广播部原来在清凉山西边山头的石窑洞里办公。备

战以后，搬到了东边山头的一孔土窑洞里，这孔窑洞里有防空洞。由于人力减少了，一个人得做两三个人的工作。为了防御敌机轰炸，播音室和发射台又从文化沟搬回阎店子。这又增加了我们工作的困难和紧张。

我们在紧张的工作中，每天都要进行军事训练。当时我们都编成了自卫军，每人发了枪支和子弹，要求大家在和敌人遭遇时，能够消灭敌人，保护自己；在发现敌人伞兵时，能把他就地消灭。大家都怀着对敌人的仇恨和必胜的信心，认真进行操练和打靶。第一次打靶时，每人打了三枪，一般的都打了十几环，有的打了二十几环，成绩还不错。每天夜晚，我们还要轮流站岗放哨。大家都没有手表，就用点香的办法计算时间，点完两支香，换一班岗。我们一边工作，一边准备战斗。当时清凉山上的医务人员也都疏散了，他们留给我一个药箱，里面有一些常用药品，还有绷带、药棉等。因为我有一点医药知识，临时又成了医生。

六

1947年3月13日中午，我们得到通知说，蒋介石、胡宗南军队即将向延安发动进攻，要准备好派人到瓦窑堡安排文字广播和口头广播的接替工作。等到下午四点多钟，接到命令，要我们立刻到瓦窑堡去。范长江同志和我乘吉普车连夜赶赴瓦窑堡。在漆黑的夜色里，路很不好走，吉普车整整跑了一夜，天蒙蒙亮的时候才到瓦窑堡。我们向廖承志同志报告了战争发展的情况和接替工作的任务。廖承志同志紧急作了具体的安排，从原来疏散到瓦窑堡的人员中留下十多人跟我们一起做接替工作，其余的人员由他和其他同志率领，立

即向晋察冀进发。他们准备到那里去建立新华社和陕北台。留下的同志由范长江同志负责，马上组成了一个临时编辑部。这个编辑部统一担负文字广播、口头广播和英文广播以及翻译、译电的全部工作。口头广播稿的编辑只有我和张潮同志两个人，他原来是《解放日报》的记者。我们十几个人集中在一个大窑洞里，搭起门板当桌子，垒起土坯当凳子。范长江同志坐在靠墙的土炕上审稿。我找了一块木板垫在大腿上，坐在土坯上编稿子，每天还是要编八千多字，上午编新闻性的节目，下午编第二天要播出的《对国民党军广播》的稿子，主要是放下武器的国民党军的军官名单和他们的书信。

延安台撤离延安前的最后一次播音是3月14日中午，是在敌机狂轰滥炸下播出的。当天晚上，我们就在瓦窑堡接替播音。当时的播音员是杨慧琳和夏沙同志。瓦窑堡开始播音以后，在延安的工作人员17日全部撤退，19日到瓦窑堡。钱家楣同志留下播音，夏沙同志去晋察冀。

瓦窑堡的播音室和发射台在好平沟，离编辑部所在地史家畔二十五里路。通信员常常另有紧急任务，广播稿编好后，就由编辑送到播音员那里。这时候的播音室非常简陋。一座破旧的小土地庙，有两层，上层做了播音室和播音员宿舍，下层是机房和机务员宿舍。播音室只有四平方米左右，话筒放在一张只有三条腿的桌子上。门上和室内挂上羊毛毡，用来隔音。在3月19日我军主动撤出延安以前，我们还是用“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呼号，从20日起，改名“陕北新华广播电台”。为了防御敌机侦察轰炸，停止了中午的播音，只在晚上播音。